

讀〈《儒家革命精神源流考》 駁正〉有感

• 劉述先

讀《二十一世紀》第五十一期(1999年2月號)王錦民君對劉小楓文的駁正，引發我一些感想，請容許我由新儒家的觀點對王文略作回應。

先由劉文說起。劉小楓對顧彬文的批評頭頭是道，但他對儒家傳統的理解是很有問題的。他將華夏民族與猶太傳統比擬，頗為不倫，完全不能引起我的共鳴。新儒家一向把「中國」看作文化觀念，我們的傳統根本缺乏現代的民族國家(nation-state)觀念。猶太教雖也有一些普遍意涵，但彰顯一特殊主義的傳統，種族的因素突出，此於猶太復國主義尤然。這不是中國傳統可以了解的東西。在我們的傳統中，所謂「蠻夷」在接受了中國文化之後，就變成了中國人，也可以成為道的載體，根本缺乏猶太民族作為上帝選民那樣的想法和體驗。彼此之間的差距不可以道里計，劉小楓卻要把二者拉在一起，其言雖辯，卻缺少說服力。王文的駁正卻一口咬定劉小楓立論後面的背景是新儒家，真不知叫人如何說起！

王文最有啟發處在它有關「素王」的討論，也是其駁正劉文之中心論旨所在，這些有待考據家的衡定。然而，這一討論與海外港台的新儒家殊少關連，因為他們都接受了西方民主政治制度的理念，毋須如康有為之託古改制，「素王」已成為一個不相干的觀念。王文認定劉小楓的說法是建築在新儒家的「內聖外王」論之上。他雖再三聲明當代新儒家的看法並不統一，也不會同意他的說法，而且他的討論也僅只限於劉小楓所涉及的範圍，但他還是加上了自己的解釋與判斷，有許多不相應的地方，故有必要略加辨正。

他以新儒家的內聖外王論是後起的觀念，並不能反映先秦思想的實際情況。我不能同意他這樣的看法。我不否認新儒家的思想有許多理想化的成分，但這些成分並非始於宋明，而是根植先秦，由孔子奠定基礎，而孟子加以發揚。王君既引述我論內聖外王的文章，或者應該了解到，我兼治哲學與思想史，必根據材料說話、作

劉小楓對顧彬文的批評頭頭是道，但他對儒家傳統的理解是很有問題的。他將華夏民族與猶太傳統比擬，頗為不倫，完全不能引起我的共鳴。王錦民君的駁正卻一口咬定劉小楓立論後面的背景是新儒家，真不知叫人如何說起！

出解釋，不像熊十力先生那樣馳騁玄想，通過《公羊》、《周官》編織了一大套東西。他的弟子徐復觀先生重視考據，早就指出這種玄想之不可信，儘管徐先生對於《周官》的考據又有其他問題。我的文章明白指出，「內聖外王」之詞首見於《莊子》，然而其理念卻更適合於儒家。所謂內聖外王的理想，就是說個人不只要做修身的功夫，還要把仁政的實施推廣於天下。《大學》的三綱領、八條目，由格、致、誠、正講到修、齊、治、平，這不是內聖外王的理想，又是甚麼？

王文似乎有一種傾向，把內聖外王狹化為「人人可以做聖人」、「人人可以做帝王」的解釋。但即此也可以在先秦儒家思想找到一定的文獻根據，並非後儒之向壁虛構。很明顯，人皆可以為聖人、為帝王，這都是從稟賦講，不是從實際成就講。此所以自孔子以後，根本就沒有聖人，何來聖王！至少回到孟子，孔子之被推尊為聖人，地位已經確定。而孟子講「五百年必有王者興」，臣下之有天命，一樣

王文似乎有一種傾向，把內聖外王狹化為「人人可以做聖人」、「人人可以做帝王」的解釋。但很明顯，人皆可以為聖人、為帝王，這都是從稟賦講，不是從實際成就講。此所以自孔子以後，根本就沒有聖人，何來聖王！



可以為王，孔子有德而不得其位，孟子已經當作一個問題來加以討論。由此可見，即使有很強的理想化的成分，實際上各種條件齊備而成為聖王，仍是極其困難之事。而這決不是孟子一人的想法，荀子也說「塗之人可以為禹」，即為明證。如此怎麼可以說先秦儒沒有內聖外王思想？有了這樣的背景，後來演變成為緯書中「素王」的信仰，也就是十分自然的事了。到晚明王學末流泰州派喜言「滿街皆聖人」，被劉宗周與東林黨斥為蕩越，不能代表儒家正統思想。

至於當代新儒家，牟先生明言中國傳統只有治道，缺少政道，所謂「曲通」，建立民主政制，必須往西方取經，與熊先生之於現代西方式的民主之缺乏相應理解大異其趣。這一轉型，要到再下一代的新儒家才更為彰明昭著。但牟先生繼承熊先生講「良知」為「呈現」，卻是一脈相承，並無睽隔。馮友蘭講「良知」為「假設」，對於康德或無睽隔，對於儒家傳統卻有睽隔。康德的「假設」(postulate) 是理論上之必要者，是思慮後 (after thought) 的結果。孟子的惻隱之心卻是良知的直接呈現，熊先生不誤也。但王文把熊先生的說法歸之於「感性」，這是很錯誤的說法。孟子、陽明講良知，熊先生在「量智」之外講「性智」，重點均在「知」，所謂「德性之知」，只能說中國傳統是理情交融，不能純歸之於感性。牟先生的改造不必人皆可以同意，卻有其理據在。王君的理解睽隔過甚，故不能不綴數語，加以辨正。

劉述先 前香港中文大學哲學講座教授，現任台灣中央研究院文哲研究所研究員。